

中国诗学的 道德批评维度

Zhongguo Shixue De Daode Piping Weidu

贺根民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中国诗学的 道德批评维度

Zhongguo Shixue De Daode Piping Weidu

贺根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学的道德批评维度 / 贺根民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5161 - 4563 - 0

I. ①中… II. ①贺… III. ①诗歌评论—中国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675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琪

特约编辑 温才妃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61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广西高校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古代文学道德学的
逻辑建构”之结题成果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3)
一 诗学·道德解题	(4)
二 中国诗学道德批评研究述评	(8)
三 研究思路·方法·创新	(19)
四 天人合一：文学道德批评的契合之源	(21)
五 宗法伦理：文学道德批评的发生基础	(29)
六 自然情结：文学道德批评的演进承载	(39)
第二章 中国诗学道德批评之范畴	(55)
一 丽	(56)
二 野	(65)
三 骨	(70)
四 放荡	(79)
第三章 中国诗学道德批评之模式	(93)
一 依经立义	(93)
二 据诗言志	(101)
三 比德见物	(110)
四 人物品藻	(118)
五 以情设教	(127)
第四章 中国诗学道德批评之主题	(141)
一 兄妹婚	(141)
二 黄粱一梦	(147)

2	中国诗学的道德批评维度	
三	荆轲刺秦	(154)
四	秋胡戏妻	(164)
第五章 中国诗学道德批评之思维原则		(177)
一	道德箴规与救赎情结	(177)
二	欲理之辨与叙事干预	(186)
三	幻化同构与道德劝惩	(194)
四	替天行道与下凡历劫	(201)
第六章 中国诗学道德批评的现代效能		(215)
一	中国诗学道德价值的重新发现	(215)
二	拯救文学话语困境的积极应对	(220)
三	重建文学价值体系的有效尝试	(223)
四	文学道德批评的现代效能举隅	(228)
主要参考文献		(241)
后记		(244)

古今中外真正古典的、伟大的作品，不挂道德规范的招牌，但其中必然有某种深刻的道德意味以作其鼓动的生命力。道德实现的形式可以变迁，但道德的基本精神必为人性所固有，必为个人与群体所需要。西方有句名言是“道德不毛之地，即是文学不毛之地”。这是值得今日随俗浮沉的聪明人士，加以深思熟考的。

——徐复观《儒道两家思想在文学中的人格修养问题》

无道德者不能工文章，无道德之文章，或可期于典雅，而终为靡靡之音。

——汤用彤《谈助》

第一章 絮论

现代学术惯性和操作规范期待新的突破，中国文学从最初的杂文学生态跋涉而行，备经历代社会文明的淘洗，在西方科学思潮的烛照下，呈现纯文学的姿态，又缘于当下文化境遇的更替，大文学观的出炉折射了学人拓新和开创交叉研究的学术勇气。道德批评是中国文学的一种基本模式，从文化生态视阈来透视中国文学的道德精神，不仅强化了道德观念建构的纵向脉络，也凸显了道德观念的文化场域，有利于建构中国诗学道德文化的古今演变谱系。我国悠久灿烂的文化脉络，道德精神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诗学的道德批评属意文学和伦理学的学科交叉，注重文学和伦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相关知识的综合运用，梳理道德观念的基本脉络，有利于重估道德批评的现实价值。从道德观念角度去挖掘中国诗学的文化生态，可以透视追求生命之善的道德思维的自律性。

传统道德与中国文学的结合，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就认为“自孔子以来至汉末都是不能离开道德以观文学的，而且一般的文学者单是以鼓吹道德底思想做为手段而承认其价值的”。^①道德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模式被提出和强调，归功于聂珍钊先生的大力鼓吹。2004 年在江西南昌市召开的“中国的英美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全国学术研讨会上，聂珍钊提倡“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该方法因为其独特的批评视角旋即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鉴于聂珍钊的学术背景，其研究主要就外国文学而论，像伦理禁忌与俄狄浦斯情结、古希腊的复仇模式等主题的探讨，未能以比较诗学的眼光来透视中国文学，却提供了一种崭

^① [日] 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孙俍工译，北新书局 1928 年版，第 47 页。

新的学术视野。苏桂宁的《宗法伦理精神与中国诗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从家国精神、人性关怀切入道德观念；王志清的《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侧重孔子、王维等文学个案来阐释中国文学的道德观念。二作对中国文学的道德观念作了可贵的探索，但其多就诗歌而论，未能全面反映中国文学的道德精神。卜召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道德》（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较为系统地分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个体和群体道德，限于选题的时限，该著未对文学与道德的发生学意义给予足够的关注。总的来说，对于中国诗学的道德文化生态的挖掘，存在着广阔的研究空间和实践需求，其研究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 诗学·道德解题

“诗学”界定有广义、狭义之别，西方“诗学”概念东来，拓宽了“诗学”概念外延。简言之，狭义的“诗学”是指有关诗歌等韵文的批评理论，有着独立自得的文化渊源，它至少有两种含义，一指《诗经》专门之学，汉代的经学中有关《诗经》的研究通称为“诗学”，1906年刘师培《经学教科书》所论“诗学”即专指《诗经》之学。另一含义则指包括历代诗歌，以及词、骚、散曲在内的韵文研究。张寅彭在《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中直接以“诗学”冠名的有朱元英《诗学金丹》、顾龙振《诗学指南》、王师培《诗学纂闻》、郑磊《诗学问津》诸书，晚清以降的“诗学”研究已经脱离汉学定“诗学”为“《诗经》学”的笼盖，民国文人丁仪《诗学渊源》、黄节《诗学》和《诗律》、陈去病《诗学纲要》中“诗学”为古代诗歌及其理论的总称。

侧重狭义来研究中国诗学，如前所论，1925年出版的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该著最初名《中国诗论史》）是最早研究诗学的专著，1925—1930年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将诗歌、词、散曲纳入“诗学”的研究范围。1924年著、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就是要“把中国各时代所有论诗的文章，用严密的科学方法归纳排比起来，并援引欧美诗学家研究所得的一般诗学原理来解决中国诗里的许多困难问题”。在中西汇流的角度梳理诗学体系。1931年朱自清《论诗学门径》仍就旧体诗而发：“所谓诗学，专指关于

旧诗的理解与鉴赏。”^①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披览古代诗歌论著，借以“志”、“情”、“形”、“境”和“神”来建构古代诗歌理论体系。袁行霈等人《中国诗学通论》主要针对历代关于诗歌和词的理论做一番勾勒和整理工作，挖掘中国诗学的民族文化本位。一般看来，中国古代诗学是指古人关于诗歌的学问，傅璇琮等人的《中国诗学大辞典》颇具代表性，其《凡例》就明确规定“诗学”为“古典诗学”。

广义的“诗学”肇始于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亚里士多德不仅探究了诗歌的种类、功能、性质，也梳理了悲剧等艺术理论，植根于一般的文艺层面来探讨诗学。该著预设了世界视野的传统诗学概念，其后西方文论界和美学界一直沿用这种广义的“诗学”概念。文艺复兴时期一度出现大量的以“诗学”命名的文论专著，“诗学”遂成为诗论和一般文艺理论的总称。朱光潜较早援引西方诗学观来考察中国文学理论，其《诗论·抗战版序》云：“在欧洲，从古希腊一直到文艺复兴，一般研究文学理论的著作都叫做诗学。‘文学批评’这个名词出来很晚，它的范围较广，但诗学仍是一个主要部门。”^② 朱光潜眼中的诗学即是广义的文学理论。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亦从广义维度来界定“诗学”：“‘诗学’并非仅仅指有关狭义的‘诗’的学问，而是广义包括诗、小说、散文等各种文学的学问或理论的通称。诗学实际上就是文学理论，或简称文论。”^③ 汉学家叶维廉《中国诗学》也将“诗学”扩大至整个文学理论领域。随着文学诗学研究的兴盛，“诗学”日益成为一般文学理论的替代。我们所征引的中国诗学，取其广义，即古代文学原理的研究，既体现目前学术界日益推进的文化研究趋向，遵循学界的习用原则，又适当照顾到行文的弹性需要，以便整体统摄中国古代文论。

“道德”一词，最早见于老子《道德经》一书：“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与“德”最初是两个概念，各有所指。“道”的

^①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

^②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③ 黄药眠、童庆炳：《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本义为道路，初见于西周金文，它是由“行”字夹一“首”字组成，是人行于四达之衢的象形，《诗经·小雅·大东》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史记·陈涉世家》云：“会天大雨，道不通。”随着人类社会和思维能力的发展，“道”被添加上道理、法则、人道等抽象含义，《左传·桓公六年》载有：“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①先秦诸子逐渐将“道”推向认识领域，加重它的哲学色彩。《春秋》、《国语》中既有天道和人道之分，又有君臣、父子之道的言说。《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子产言：“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②天道为宇宙创生的本体，人道则为世人所遵循的伦理本体。不过后世文人接续的多是具有立言效应的人道。《论语·述而》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③“道”、“德”倾向于行为规范的意义。《荀子·儒效》所论十分确切：“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后世儒家，像韩愈、朱熹便夸大人道的立言效果，成为文人无可逃避的道统谱系，韩愈《原道》云：“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④至于道统传承亦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⑤道家学派以其来概括全部学说，升华了道的本体意义，从而成为融哲学、伦理、政治等文化于一炉的杂合概念。

“德”字会意，其左边，甲骨文中的形符，表示道路，其右边表示用眼睛直视前望。两形会意，表示目不斜视，双脚不偏离道路，直达目标。《论语·述而》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⑥汉字的“德”字下面是一颗心，这是一颗善良之心，也是一颗辞让之心、羞耻之心。许慎《说文解字》释“德”云：“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德”涉及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亦指向自我内心世界。朱熹《四书集注》为《论语·述而》作注云：“德者，得也。

^① (春秋)左丘明：《左传》，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17页。

^② 同上书，第281页。

^③ (宋)朱熹：《四书集注》，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④ (唐)韩愈：《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

^⑤ 同上书，第122页。

^⑥ (宋)朱熹：《四书集注》，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①“德”具备了实践效应，还呈现出一定的社会担当色彩。“文德”一词最早见于王充的《论衡·书解》，其云：“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文与德的联系，维系历代文人对道德的关注力度。王充的文德主要还停留于对德行文采的留恋，真正就为文之德来阐释文德的，则是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以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设身处地，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文学创作，体现出足够的敬业精神。朱熹《答杨宋卿》载：“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按照儒家的仁义道德，设置了追求诗工的途径。老子的《道德经》内容分为《道经》和《德经》，是书中，“道”和“德”是两个词，后世亦以“道德”为《道德经》的省称，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载有：“世家遗旧世，《道德》付今王。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②《荀子·劝学篇》中“道”与“德”二字始连用：“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道德指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准则和规范。战国以降，“道德”逐渐成为一个常用的哲学概念，《韩非子·五蠹》就云：“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愈《原道》亦载：“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③

当今学者多从哲学层面阐释和界定道德，其一般指人类生活或行为的价值规范和善恶标准，并由此欲达到的完善境界。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道德”包含着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内容，客观方面是指一定的社会关系对社会成员的客观要求，“道德的主观方面，包括道德行为或道德活动主体的道德意识、道德判断、道德信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等”。儒家学说是历代中国社会道德思想的依据，它讲究三纲五常，三纲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

^① (宋)朱熹：《四书集注》，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② (唐)杜甫：《杜甫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③ (唐)韩愈：《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人伦关系，而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则规定了个体的内在品性要求。以《十三经》为基础的儒家经典是传统道德的思想来源，自宋明以来，《大学》与《中庸》被列为“四书”之首，因为它们最扼要地阐明了儒家思想精髓。孔子创立儒家道德思想，其道德思想核心为“仁”，细分即为仁者爱人、克己复礼、讲孝悌、主忠恕，仁是众德之总。孟子基于人性本善论，提出“四德”、“五伦”之说，荀子则据于性本恶之说，倡导化性起伪、修身自强的道德理念，先秦诸子的道德言说积攒了厚重的道德文化基础，也铺设了后世道德文化的演变脉络。

漫长的岁月积攒了传统文化以“礼”为中心的教化体系，中国家庭结构是以父子、婆媳绵延为主轴的父子型家庭，亲子关系远胜夫妇关系，孝悌观念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传统婚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亲亲、尊尊是不可变革的社会信条，基于家庭、家族而放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宗法伦理型社会。传统道德是一种德本意识形态，它遵循重义轻利的价值追求，信奉执两用中的处世态度，家国一体的宗法伦理成就了传统道德的文化生态，传统道德具有浓郁的价值理性色彩，仁义理想人格塑造是个体道德修炼和追慕的目标，社会和个体在奉孝行仁的实践中获得价值满足。

二 中国诗学道德批评研究述评

文学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文学与道德伦理的关系研究是一个古老而又现实的话题。它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已有长足的进步。不仅体现于理论思维维度的深化，其学科建设本身也备受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体系建构、重构至今仍是方兴未艾的话题。文学道德批评尽管一度被视为陈腐的话题而备受排斥和冷落，但是道德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从未消歇。文学不单是现实生活的纯客观反映，作为一项复杂的精神劳动，文学活动中或显或潜地存在道德尺度的色彩，离开伦理道德，文学研究几乎无法展开。早在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言说中，就肇始了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之流，儒家诗教观打造了厚重的文学价值大厦，任何作品都带有一定的功利指向，文学消费过程中所展示的道德感召或训诫力量显示传统文学的道德指引，文学的审美功能成为实现教诲目的的途径，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道德伦理规范形成、解构的历史，无论是作

品的道德预设、还是叙事话语中的道德干预，传统文学与道德文化相互发明，共同夯实了具有东方神韵的文学道德宝库的基础。

（一）文学道德批评的方法与效用

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是聂珍钊的发明。2004年10月，聂珍钊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一文，该文就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基础、批评对象与内容、思想和渊源探究分析，首次明确亮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论。他又于当年的12月，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刊登《剑桥学术传统与研究方法：从利维斯谈起》，以利维斯为个案探讨文学伦理学批评。聂先生认为文学伦理学不是一种新的学科，而是一种批评方法，它主要侧重伦理的立场来解读、阐释文学作品，“即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① 在聂先生的鼓吹下，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掀起一股文学伦理学的研究热潮。刘茂生《王尔德创作的伦理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援引文学伦理学方法，披览王尔德的作品，就童话、小说、戏剧进行分类分析，揭示其塑造唯美人物形象的道德前提，挖掘小说文本所承载的道德主题。朱卫红《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中的理查生小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基于文学伦理学的批评立场，视理查生小说的道德主题、人物情感为一个有机整体，运用伦理放大镜来考察小说的事件与人物，揭示小说如何通过主题、事件、人物、情感和书信体叙事实现道德说教的目的。刘、朱二位学者均为聂先生的博士，上述二作亦为各自的博士论文，如此，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开出一片鲜艳的花朵。

文学道德批评方法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它跟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法结合，显示广阔的适用范围。王德清在个案分析王维、苏轼、陆游、元好问、王渔洋等诗歌特色的基础上阐释中国诗学德本意识的整体思维方法：“诗学德本精神的研究，或者是文学的德本批评，即在于十分珍视中国传统诗学中的辩证思维，看重‘内省’和‘顿悟’的直觉思维，考察有机整体观对古代文学批评的范畴体系的影响，注重

^①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宇宙人生一体观的整合思维方法对批评方法与批评风格的有机渗透，吸纳西方文学批评逻辑分析的严整思维，创造性地张扬和落实批评中的德本精神。”^①吸纳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观，辩证思维、直觉思维和西方系统思维化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学道德批判方法。文学道德批评作为一种方法，势必以具体的文本为依托，文本所承载的知识涵盖往往是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生态的形象折射。张文浩《宋代儒家道德诗学的研究路径》（《内蒙古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一文以文学道德批评去梳理宋代诗学，凸显民族融合和文化转型的背景，以历史变迁和中心人物分析为经纬，展示了伦理美学、价值哲学和文化诗学的统一。戴峰《宋元戏曲家伦理观念的民俗学阐释》（《四川戏剧》2011年第3期）就文学、道德、民俗学的交叉来深挖宋元戏曲的伦理特点，披览文学观念变迁与民俗文化的内在联系，可谓正得其宜。

如果说中国诗学道德批评援引其他学科研究方法，有效体现了学科交叉特征，那么诸如依经立义、据诗言志、隐喻取譬、人物品藻等方法的梳理，则展示了中国诗学道德批评的本位方法。美国汉学家艾兰采用隐喻理论来诠释中国早期的哲学观念，她指出中国哲学中最有意义的概念都源于水和植物的本喻，客观道出道德批判方法论体系中的隐喻因子。她认为孔子观水、老子以“水”作为“道”的概念原型，是因为先秦诸子假定“同样的宇宙原则也构成了人类行为的基础，他们通过体察水与其他自然现象以求提取自然界的原则，这将使之了解人类及其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②传统文化的取譬思维展示了中国诗学的即兴体悟特点，也侧面阐释了古代文学中山水之想的思维路径。贺根民归纳中国诗学道德批评方法，费力颇多，他的系列论文，如《论先秦比德观念的生成》、《文学教育：诗言志说的一个文化侧面》等有效还原古代文学生态，全力爬梳中国诗学道德批判的方法原则。其《欲理之辨与中国文学的道德思维》整体统摄古代文学的欲理纠葛，指出：“沉郁深厚的欲理之辨，品咂出捉摸不定的人生况味；激昂酣畅的欲望宣泄，飞扬着豪情万丈的文人情愫，既要求廉洁自律、恪守人性本位，又不隔绝对基本

① 王德清：《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9页。

② [美]艾兰：《水之道与德之端》，张海晏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6页。

的生存环境与生命情趣的眷恋。”^①侧重生命本位的救赎行为形成的悖论结构，既真实地反映了尚生贵行的传统文化脉络，也体现了道德批判的生命之喻特征，欲理之辨展示品文论人的叙事文学传统。

中国诗学的道德批评是一种贴近古代文学生态的批评方式，文学道德的审美呈现有效避免了以往文学研究中的误读和臆测，致使那些全然不顾传统文化生态而打出女权主义旗帜，各种为女性翻案的文章正呈下降之势，这在叙事文学领域表现尤著，譬如视潘金莲为明代中后期追求自由爱情的代言人、过高体认杜十娘追求美满婚姻的举动。这些研究误区的存在，除了研究者各自鼓荡的满腔热情外，不无主题先行的色彩，有意或无意漠视传统文化生态往往是其症结之所在。天命人受、家国一体的宗法伦理模式，铸造成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传统文学承载的道德意识，往往是社会文化系统本身所赋予的一种文化指向，并由此形成具有东方色彩的文化艺术语境。李劫就明代文学思潮的新变来把捉西门庆形象的时代意义：“正如诗歌在明代有了性灵风貌，《金瓶梅》开始说出了为道德说教长期掩盖的历史真相。男人的造型不再按照男人的道德要求诉诸关公武松孙悟空那样的英雄，而是按照生活的本身的模样写成西门庆式的新兴商人和情欲顽主。这位主人公一面像夏洛克那样按照中国社会所规定的方式经商，一面将中国男人在庭院中的食色本性公之于众。”^②西门庆完全抛弃了修、齐、治、平的传统信条，无所留恋地走上了奋斗与享乐的道路，花天酒地，最后葬身欲海。他的纵欲折射了明代好货好色的世情本色，道出了古典小说塑造人物观念的时代进步。运用文学道德批评方法，凸显了还原文化场景的人物形象分析理路。

文学道德批评带有知人论世的社会历史批评色彩，它在推源溯流的基础上强化了文本细读的力度。陈立人《刘兰芝形象的道德内涵及其典型意义》（《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就人物的社会存在、生活道路来挖掘古代妇女的悲剧命运，展示作品的社会批判色彩，该文认为刘兰芝“淑女—贤妻—烈女”的道德实践，足以概括古代妇女道德的基本内涵。由特定社会的典型形象推及传统妇女的道德生态，该文较

^① 贺根民：《欲理之辨与中国文学的道德思维》，《山西师大学报》2011年第2期。

^② 李劫：《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东方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296页。